

基于社会空间发展的城市街区尺度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李晶晶，彭小柯

(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社会物质经济文化影响城市空间的拓展,最终在城市街区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体现。文章以街区尺度为核心,阐述了街区的区概念、中西方历史变迁,分析街区尺度的构成要素与影响因子,最后结合成都市规划发展阶段说明成都街区的尺度发展的阶段性要点与特征。

【关键词】社会空间发展；街区；尺度

【中图分类号】 TU984.191

【文献标志码】 A

1 街区的概念与中西方历史变迁

1.1 街区的概念

街区即“block”,是一个舶来词。来自字典的解释是:街区,主要是由四条城市道路(或河流、铁路等边界)围成的被计划修建建筑的区域,或者可以理解为城市被道路或其他线性元素划分为一块块的区域,每块区域内作为住宅区、商务区、行政区或办公区等功能,区域内可能被单独建筑体占据也可能被建筑群体占据,然后由内部道路串联。

从形态学角度看,街区是构成城市的基本面要素,绝大多数城市都是由街区以某种内在机理组合构成;从社会学角度看,街区是人们工作、生活、娱乐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管理与政策法规执行的基本单位;从城市风貌角度看,街区的空间与建筑意向即代表着城市的特点与性格。因此,城市街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2 中国街区历史变迁

奴隶社会时期的西周,中国出现了一套营国做邑的制度,最早出现的城市管理单元称之为闾里。据学者考证,闾里大约是500 m见方的正方形围城,面积约为17 ha^[1]。封建社会盛期,隋唐时期,闾里被改称为里坊,“里坊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划分和管理方式。规模不再是500 m见方,因为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总体上规模扩大^[2]。封建社会末期,元大都被横竖干道分为50个坊,然后在各坊内设东西方向、相互平行、间距约70 m的胡同。70 m作为街区的短边长度,同时也刚好是一个三进四合院的进深,街区的长边则从200~400 m不等。明清都城基本延续了元大都的街区规划格局。

近代至1949年后,中国的城市建设基本遵循苏联大尺度、封闭式小区或大院的模式,特别是北京,一些街区的尺度约在500 m见方甚至长达1 000 m。而在其他一些西方殖民文化较深、街区尺度小的城市,大街区造成了街区尺度混乱、多种类型街区拼贴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在各市新区建设地产开发、汽车交通的背景下,宽马路、大街区又再次在很多城市铺展开来。

21世纪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与《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文中都意识到了大街区、宽马路、小汽车交通模式给城市带来的巨大问题而提出相反的“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等”城市规划建议。可惜由于某些城市管理者意识落后、居住小区安全管理问题、封闭大院工作模式等种种实际的问题,新的城市街区模式和开放街区的未能在中国城市得到广泛普及。

1.3 西方街区历史变迁

西方古代时期,古希腊的希波丹姆规划的一种以棋盘式道路网为骨架的城市米利都,街道间距约30~50 m,在网格内形成面积基本相等的矩形街区。古罗马基本继承了古希腊时期的布局特征,但更灵活,出现很多非直线街道。因此城市街区尺度大小不一,但基本介于70~150 m之间。在首都罗马,由于人口增多出现了越建越高的建筑,6层、7层屡见不鲜甚至出现10层的建筑,因此街区的三维高度发生巨变。

中世纪时期西方城市发展,街区尺度基本保持在100 m左右,如中世纪的米兰;到12世纪后,在城市边缘地带出现了200 m见方的较大尺度的街区,但不是当时的主流形态。文艺复兴时期,城市除了广场和几条大道外基本维持原状。巴洛克时期城市专注与修建笔直宽阔的大道来梳理交通问题,在巴黎和罗马的改建中都有体现,但街区的尺度变化不大^[3]。

工业革命至20世纪前,伴随工业革命的脚步,城市人口快速聚集,对于住宅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一些城市的老城区基本遵循传统街区的小尺度模式,但在三维高度上长高以便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在老城区的边缘或新建城区,街区

[定稿日期]2019-06-12

[基金项目]四川音乐学院院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YXS2017022)

[作者简介]李晶晶(198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城市设计。

尺度明显增大,达到200 m甚至更大。当然城市需要工厂、道路需要马车,大型建筑类似水晶宫的大型建筑都要求城市出现大型的街区。

20世纪初期,伴随汽车交通的普及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当代的规划学者在新区建设时都普遍倾向于较大的街区尺度。例如柯布西耶全面规划设计的印度昌迪加尔,街区尺度达到800 m×1 200 m之大;1929年,佩里提出“邻里单元”的理论,街区尺度达到800 m见方。这些理念与实践成为现代新城建设中大方块、大街区规划模式的源头。

20世纪后期,新城市主义提出的以“传统的邻里开发”与“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两种模式都是在提倡传统尺度的回归、步行与公共交通方式的回归。诞生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反当时主流规划界的理论,提倡小街区、亲切尺度、步行模式与多样化等理念,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并流行半个世纪之余成为建筑与规划院校必读书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街区总体来说继承了千年来的尺度,在近十几年意识到大尺度街区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关的修改理论。而西方则经历了100 m内的小尺度街区到500 m以上的大尺度街区后回归小尺度的城市规划路径。

2 街区尺度的构成要素与影响因子

建筑整体或局部与人或人熟悉的物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人的感受称之为尺度。何谓街区尺度?城市街区的二维尺度、密度、高度、空间模式、街道宽度、空间节点等与人或人们熟悉物体比例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行人的感受则称之为街区尺度。

需要注意的是,街区尺度不应仅限于拓扑学中平面几何的方法对街区平面尺寸与街区道路密度的研究,而应引入三维高度与空间概念进行研究。

2.1 街区尺度构成要素

2.1.1 街区二维尺度与街区密度

街区的二维尺度主要包括街区的形态、尺寸大小、外围街道宽度,是构成城市平面肌理的要素、城市形态结构的基本单元、城市三维空间生长的基础。不同城市因为地理条件或政治历史等原因促成了其不同的格局,例如块状布局、条状布局等,但归根结底,城市还是由不同类型的街区组成的,一般认为城市的规划层级为城市-片区-街区。同时,城市的交通道路是蛛网密布还是开阔舒朗这些都由这座城市的街区大小、道路密度、路口间距所决定。

街区密度的概念与建筑密度相近,指街区内建筑基地面积与街区面积之比。从土地开发模式讲,街区密度的高低是街区开发强度的重要指标。从图底关系看,它是影响街区平面布局的重要因素,密度太高则建筑实体强于开敞空间,整体图面略显布局紧张;密度太低则开敞空间远大于建筑实体,整体构图显得空旷疏离。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二维层面的量化去制约影响街区的三维空间尺度^[3]。

2.1.2 街区高度与空间模式

街区高度是街区尺度在竖向控制元素,不同街区,通过高度差异来表达不同的街区尺度。街区密度一定的情况下,高度直接决定区域建筑容积率,对于控制区域建筑总面积起

到关键作用^[4]。

街区的空间模式是指建筑占据街区的方式以及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分为周边式、居中式、均质排列式、混合式。不同的空间模式适用于不同功能类型的街区:周边式建筑沿周边布置,留下较大的内向型空间,多见于大院与国企单位街区;居中式建筑占据街区中心位置,在周边留下较大广场或其他公共空间,整体呈中心感、外向型特征,多见于城市CBD、Shopping Mall或带有公共性质的机构;均质排列式又可分为行列式、散点式等,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比重均衡,多见于住宅街区;混合式则兼具上述两种或多种空间模式,集合了多种特征,多见于复合型功能街区。可以看到,不同的空间模式呈现不同的特性与性格,会给人不同的尺度感,是塑造和影响街区尺度的重要因素(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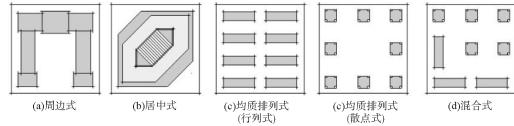


图1 街区空间模式

2.1.3 街区外部道路空间

围合街区的道路也可以看成街区的一部分,因而组成道路的空间特征也会影响街区的尺度。街道空间由道路宽度、沿街建筑界面、车行与人行宽度比例、景观小品等共同构成。比例适宜、街面开放、边界柔软的街区给人的感受是亲切而热情的,人们常常乐于在此处活动;而比例尺度巨大、街面封闭、边界冷漠的街区给人的感受则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在这里只能看到呼啸而过的机动车基本很少行人愿意在此处停留(图2)。



图2 尺度过大界面封闭的街区外部

2.2 街区尺度影响因子

城市层级分为城市-片区-街区,从战略层面制定的城市总规定位与空间发展模式自上而下地影响城市片区与街区。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街区尺度同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建筑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影响。

2.2.1 社会经济因素

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的虹吸效应下,城市平面空间拓展速度无法与人口增速相匹配时,城市势必转向三维空间拓展。CBD区域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在密度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容积率,街区三维高度不断提高。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社会主体活动与街区尺度:小商品经济社会需要更多的小尺度街区,因为更小块的街区能够增加街道的绝对长度,以便于布置更多的店面,同时较窄的街道更善于将街道两边的商业氛围连为一体;工

业化程度高的社会要求城市提供大尺度街区以便安置大型工业厂房、会展等区域性大型建筑，同时配套足够宽度的机动车道路。

2.2.2 政治因素

城市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以西周时代的中国为例，“闾里”与其说是城市结构单元不如说是国家政治管理单元。它后期发展为“里坊”并拥有了定量的尺寸，逐渐发展为城市结构单元后其政治属性也一直未曾消失，并且影响中国城市规划建设近千年之久^[3]。

“尺度不是抽象的建筑概念，而是具有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概念”^[4]。大量权利机构常利用较大面积街区，建筑布置空旷舒朗又保持高度对称统一，渲染出庄重威严又容易被行人感知、敬仰甚至压抑的氛围，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力量与尊严的目的。商业街区则热衷于用自由不规则的建筑平面形态占据街区，留出大量与道路相连的外部公共空间、设置景观小品等塑造轻松宜人的街区尺度。

2.2.3 技术因素

伴随交通技术的革新，城市交通工具经历步行—马车—汽车的转变，城市街区为适应不同交通工具特点越长越大。马车交通相较步行更快更便捷，与100 m左右、适合步行的小街区路网结构显然需要变革：街区变大、道路变宽。汽车比马车更快更宽且需尽量少的路口，当汽车交通大规模普及后人们发现1~15 km干道间距更为合理，在干道间再设置两到三条支路基本满足交通需求，于是将现代汽车交通主导的城市街区尺度基本确定在500 m左右。

19世纪，建筑材料钢材、水泥、玻璃在建筑上应用，在短时间内建造高度更高、体型更庞大的建筑变成现实。纯钢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玻璃和钢建造的水晶宫相继亮相，尺度巨大的现代建筑要求街区的尺度做出相应变化：二维尺度更大、高度更高。

3 成都社会空间发展与街区尺度演变

社会空间发展指的是社会物质精神层面与城市空间拓展层协同发展。其中，社会物质精神层面发展是内涵，城市空间拓展是表征，最终体现在城市街区及建筑上。

3.1 1949年以前

1949年前，老成都保留下来的格局为：两江环抱中心城区，其中皇城居中、少城位于西侧、大城位于东侧。规划格局保留较好的少城，又名“满城”是清朝为驻扎在此地的官兵修建的城中城。少城街区格局与北京的胡同相似，街区短边70 m左右，长边不定，但不超过350 m。宽窄巷子基本保留少城的城市肌理，建筑平面布局也与北京合院建筑相似，街区单位高度以单层为主，局部二层（图3）。

总体来说，1949年前成都市街区二维尺度较小、密度较大、空间模式呈现内向型、三维高度较低，与当时的经济结构、步行交通模式相适应，整体街区空间尺度呈现相当典型的中国传统城镇特征。

3.2 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

中央政府提出在三个五年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发达国家。1954年成都市总体规划中将



图3 宽窄巷子（图片来源：网络）

成都定位为省会、精密仪器、机械制造轻工业城市。

1954年的总体规划中，一环路与二环路西段范围内，以两江环抱的旧城为中心，街区除皇城西侧少城的街区尺度最小，短边70 m以外，其他区域街区平面尺度短边150~200 m；长边150~300 m，功能为居住区（图4）。外围布置的工业区与仓库区平面尺度在老城区数倍以上，然而后来城市规划建设未能与上述内容完全一致，所以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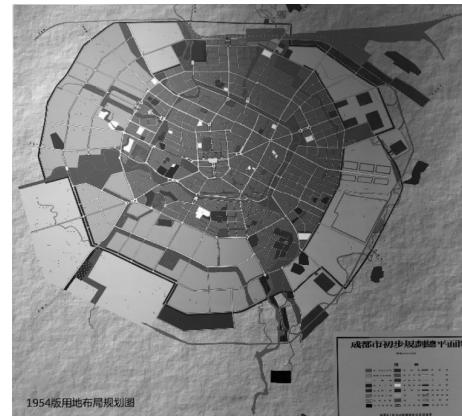


图4 1954年成都市总体规划

1952年，建于中心城区内的成都百货大楼，三层为主、局部四层、最高点约22 m，是当时成都的地标性建筑（图5）；1969年，建于天府广场的钟楼，共7层，高69 m，成为当时的成都中心标志，但当时建筑高度普遍不高，城市内还有大量一层或两层的传统建筑，少数三层新建建筑，20世纪60年代成都市八宝街明显可以看到这一特征（图6）。由于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地势平坦辽阔，城市街道较宽阔，街区二维尺度较大，城市三维高度介于两到三层之间，街区整体尺度比例开阔舒朗。



图5 成都市百货大楼

3.3 20世纪90年代高层大楼兴起

20世纪90年代成都市总体规划将成都定位为四川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南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图 6 60 年代成都市八宝街

城。当时的成都经过改革开放,城市物质经快速积累,促进城市金融与商贸中心的诞生。在中心城区,街区二维尺度不变的基础上,三维尺度不断被刷新,“摩天大楼”一词横空出世。

当时第一个百米大楼出现在商贸中心:春熙路和金融中心骡马市一带。20世纪90年代初,被誉为“西部第一高楼”,高118 m 的蜀都大厦建成;紧接着高度160 m 的中银大厦拔地而起,后来建筑越长越高,几近200 m。但由于当时100 m以上高度的大楼大多位于两江环抱的旧城区域内,规划格局基本保持原貌,街区二维尺度没有发生变化,仍旧是短边150~200 m、长边150~300 m。三维方向的剧烈变化带来的直观感受是街区长高了,变得苗条而修长,城市空间与街道显得繁华而开阔,体现出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内陆城市的气度与面貌(图7)。



图 7 成都中银大厦街道景观

3.4 21世纪新区建设

21世纪,成都市总体规划将成都定位为四川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以金融、商务、会展、研发、软件为重点的高新南区为例,根据不同街区二维尺度分别研究。

位于高新南区天府大道两边街区二维尺度比中心城区增大近一倍,短边250 m以上,长边500 m以上;环球中心所在的锦城广场街区二维尺度达到短边600 m、长边1 000 m之大!建筑除少数产业园区外,写字楼、住宅高度基本都在100 m以上。少数200 m以上超高层建筑如银泰中心、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双塔等都集中在天府大道两旁,与近80 m宽的天府大道以及两边的大尺度街区共同构成了与大尺度著称的北京相似的外部空间氛围。而在东西向天府一街至天府五街、南北向益州大道与天府大道范围内为商务写字楼集中区域,街区二维尺度延续成都中心城区,短边150~200 m、长边150~300 m。建筑多为写字楼或公寓,高度均在100 m以上。除建筑风格不同外,街区二维尺度与高度以及街道

宽度均与20世纪90年代中心城区骡马市一带的街区相似,创造出尺度适宜、空间疏密得当、汽车与行人共享的外部公共空间(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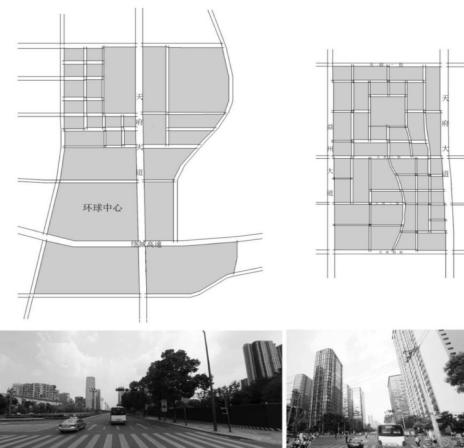


图 8 天府大道近环球中心区域与天府一街至五街区域平面对比

总结发现,成都市从1949年前发展到如今,伴随城市社会物质精神的长足发展、规划定位的不断修订,街区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49年前到21世纪新区建设,街区的二维与三维尺度交替增大的同时也意识到与交通规划、空间氛围、商业模式等因素之间的联系。例如高新区的天府大道是成都的南北主干道,连接老城区中心与新区,交通流量巨大,因此两边的街区的二维尺度与三维尺度都比较大;而天府一街至天府五街、益州大道与天府大道范围内毗邻主干道,作为城市新型商务CBD,街区二维尺度则选择人车共行200 m左右的中等尺寸。这种街区的划分模式既与城市街道等级相又与街区功能相关,既考虑了人行交通的安全又考虑到车行交通的顺畅,具有很高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

4 小结

城市街区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万象的载体,它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承担着现代生活更表达未来人类文明的精神。一篇短小的论文无法表达它所蕴含的全部内容与讯息,但希望本文能通过对中西方街区历史脉络的简单介绍、街区尺度构成要素的片面梳理之后,建立起成都市街区历史发展演变的知识背景与逻辑构架,试着去找出因果、抓住联系,为了街区、城市、我们工作生活的物质环境做出一点微末的尝试和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朱玲玲. 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初探[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2):58~65.
- [2] 郝星荣, 李强. 井田制下的周代城市格网[C]// 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中国广东东莞, 2017.
- [3] 刘代云. 论城市设计创作中的街区尺度塑造[J]. 建筑学报, 2007(6):1~3.

(下转第23页)

间去协调。

比如北方城市冬储菜的贩卖。这是一方水土带给一方居民的生活记忆,是这片土地人们生活方式的历史延续。即便是现代化科技也无法替代,甚至这是需要被保护起来的生活方式。按照现有的管理制度,毛驴拉车不允许进入城市环路,这样人们的生活还是因被大机械取代而减少了生活体验的灵动趣味。之后,交易市场被限制在环路方圆千米范围内。为了保障城市内部生活的公共秩序,这样的规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以及破坏人们的生活空间。但依照之前所言,生活的烟火气被抹杀,这样的调控管理变成了为交易而交易,少了一种体验的趣味。其实我们在空间规划对其稍加引导,开放非正式空间的使用权限,这一些列问题将会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冬储菜市场被限制的根源在于对城市交通秩序的影响、对环境卫生的破坏和对城市空间的干扰。在交通秩序方面,限制通行时间,只允许在规定时间段开放通行许可。在环境卫生方面,强调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空间秩序引导方面,成立专门的临时领导小组,组织登记进城贩卖人员信息,并对其之后交易行为进行监管。领导小组负责寻找可利用空间,如尚未规划使用的露天场地、天桥下的步行空间等等。充分利用城市资源服务于人们,因规划使城市生活更有秩序而不失烟火气。

4 公众参与

对于一个城市最了解的群体,还得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公众参与早已是规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规划的落地实施最终将服务于广大群众。由此可见公众将是一个规划案是否合理的直接发言人,在规划初期集中采纳群众的意见会是一个很有必要的环节。在现有城市现状之中,哪些元素是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哪些方面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麻烦需要及时调整,哪些方面需要深化细化加以改进。在规划方案草拟之后,哪些调整不合理,哪些方面还没

有考虑到位。这些问题,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才对此获有发言权。因此,鼓励公众参与到规划之中,使得规划方案在满足规定要求时还兼顾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5 结论

城市的发展有他自己的生命力,我们在规划之中应做的是引导而不是控制。非正式空间也属于城市公共空间,在其中不乏有人们生活的痕迹。在非正式空间发展中,合理的规划可以体现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发掘出更大的潜力为城市建设做贡献,为居民生活供服务。对于非正式空间发展宜疏不宜堵,不能仅因为事物劣势的方面便将整个规划体系抹杀。城市规划可以让生活更美好,非正式空间的合理利用会让生活更有烟火气息,提升幸福感。

参 考 文 献

- [1] 郝石盟. 宅形与文化[J]. 世界建筑, 2018(3):121.
- [2] 毕洋洋, 王晓炎, 田芃, 等.《建筑模式语言》背后的中国传统空间智慧[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5(5):67-72.
- [3] 隋研吾. 消融客体与逃脱城市[J]. 城市环境设计, 2012(7):100-101.
- [4] 卢健松. 自发性建造视野下建筑的地域性[D]. 北京:清华大学, 2009.
- [5] 李扬. 地区建筑演进与发展初探[D]. 北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2009.
- [6] 吴彤. 自组织方法论论纲[J].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1(2):4-10.
- [7] 邹广天. 建筑计划学的研究方法[J]. 建筑学报, 1998(3):40-42+3.
- [8] 徐巨洲. 空间论怎样评论城市的混乱——读《隐藏的秩序》[J]. 国外城市规划, 1994(4):49-52.
- [5] 布莱恩·劳森 空间的语言[M]. 卢芳,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上接第 20 页)

[4] 肖亮. 城市街区尺度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2006

谨致作者

敬请本刊作者允诺:稿件中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寄给本刊的稿件(论文、评论、图表、照片等)自发表之日起,许可本刊网站和本刊授权的网站上传播。

对于上述合作条件有异议者,请在来稿时申明;未作申明者,本刊将视为同意。

谢谢合作,并致诚挚敬意。

《四川建筑》编辑部